

在华耶稣会士 与后“礼仪之争”时代 ——以德意志耶稣会士魏继晋为例*

柯 卉

摘 要：德意志耶稣会士魏继晋(Florian Joseph Bahr, 1706-1771)于1738年抵达中国。当时,天主教内部已经禁止就中国礼仪问题再行讨论,中国境内亦已禁止天主教公开传播。与其他在京欧洲传教士一样,魏继晋通过提供宫廷服务,获得在华居留权,但他视在华传教为第一要务,为此积极争取来自欧洲的经济支持,重视与欧洲尤其是德意志地区的信息交流。1755年魏继晋获得新教学者完成的《中华帝国全志》德文本,不满其中有关在华耶稣会士的部分记述,撰《驳谬说书》加以辩驳,以期向德语区读者证明,耶稣会士才是中国信息的权威发布者,希望德语区读者继续相信并支持天主教在华传教工作。

关键词：魏继晋；耶稣会士；《中华帝国全志》德文本；《驳谬说书》

作者简介：复旦大学 历史系 博士后 上海 200433

中图分类号：K835.165.15

文献标识码：A

文章编号：1005-4871(2017)02-0081-16

* 德国奥古斯都大图书馆(Herzog August Bibliothek)和鲁尔夫-乌苏拉·施耐德基金会(Rulf-Ursula Schneider Stiftung)为笔者提供了研究资助,特此致谢。

十七世纪以来,欧洲入华传教士对中国礼仪问题始终无法达成一致理解,最终引发康熙晚年北京朝廷与罗马教廷之间的外交纷争,此次外交争端也被称为狭义的“中国礼仪之争”。^① 罗马教廷最终在1742年通过决议,以教皇本笃十四世(Benedict XIV, 1740-1758年在位)的名义颁布《自上主圣意》(Ex quo singulari)^②, 强调严格对待中国礼仪,禁止教民尊孔祭祖,有关中国礼仪问题教内禁止再行讨论。罗马教廷强硬的态度,加之康熙以后的清代君主全无亲近天主教之意,导致十八世纪以后天主教在华传教全面陷入低谷。不过,以耶稣会士为主的欧洲传教士并未中断来华,他们中掌握特色技艺的少数人出入宫廷,希望在皇权之下争取有限的传教空间,在困境之中努力维持与欧洲方面的沟通,力求为耶稣会在华传教争取必要的经济扶助与舆论支持。出生于今天西里西亚法尔肯堡(Falkenberg)的耶稣会士弗洛里安·约瑟夫·巴尔(Florian Joseph Bahr, 1706-1771)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到中国,其耐人寻味的中文姓名“魏继晋”何人所起,今天已不可考。维利·亨克尔(Willi Henkel)在《弗洛里安·约瑟夫·巴尔(1706-1771),一位在北京宫廷的西里西亚耶稣会士并乐师》^③中对魏继晋的生平事迹有较完整的概述,但并未进行深入阐释。夏伯嘉的《贵族赞助人与耶稣传道会:富格-韦伦伯格·冯·玛利亚·特蕾西(1690-1762)和中国、越南的耶稣会士们》^④简要介绍了魏继晋在华事迹。夏著特色在于文献选录,刊载有魏继晋与富格伯爵夫人(Maria Theresia von Fugger-Wellenburg, 1690-1762)的来往信件以及本文随后将讨论的魏继晋著作摘要。

—

魏继晋,字善修,1706年出生于欧洲中部的西里西亚,1726年在波西米亚教区入耶稣会。关于魏继晋的国籍问题存在一些争议。法国学者费赖之(Louis Pfister, 1833-1891)将其称为“德意志传教士”;法国学者荣振华(Joseph Dehergne, 1903-1990)同样认为,应将魏继晋认定为德意志人。^⑤ 此前提到的亨克尔给魏继晋的定位是“一位在北京宫廷的西里西亚耶稣会士并乐师”;美国学者斯坦尼斯拉

① 关于中国“礼仪之争”的文献与研究,参见李天纲:《中国礼仪之争:历史、文献和意义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8年版;[美]苏尔、诺尔编译:《中国礼仪之争(1645-1941):西方文献一百篇》,沈保义、顾卫民、朱静译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1年版。

② 1742年教皇谕令又名《从特殊处》。

③ Willi Henkel, „Florian Bahr(1706-1771), ein schlesischer Jesuitenmissionar in China und Musiker am Hof in Peking“, in *Archiv für schlesische Kirchengeschichte*, Band 34, Hildesheim: August Lax, 1976, S. 59-89.

④ R. Po-Chia Hsia, *Noble Patronage and Jesuit Missions: Maria Theresia von Fugger-Wellenburg (1690-1762) and Jesuit Missionaries in China und Vietnam*, Rome: Institutum Historicum Societatis Jesu, 2006.

⑤ [法]荣振华等:《16-20世纪入华天主教传教士列传》,耿昇译,桂林: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2010年版,第466页。

夫·叶茨尼克(Stanislav Juznic)称魏继晋为“波西米亚音乐家”^①；英国学者傅熊(Bernhard Fuehrer)则认为魏继晋出生在西里西亚,当时该地区事实上属于奥地利帝国。^② 无论魏继晋出生地的归属,他的母语为德语这一点想必没有疑义。

1738年魏继晋抵华,与他同期抵京的耶稣会传教士还包括来自维也纳的南怀仁(Gottfried Xavier Laimbeckhoven,1707-1787)、出生于今天斯洛文尼亚的天文学家刘松龄(Augustinus von Hallerstein,1703-1774)以及出生于巴伐利亚的鲍友管(Anton Gogeisl,1701-1771)。其中刘松龄、鲍友管与魏继晋凭借特色技能服务北京宫廷。

魏继晋的父亲是一位风琴演奏师,大概是受遗传及家庭影响,魏继晋会演奏小提琴,懂得修理管风琴。与他同期在京的欧洲传教士中亦不乏熟悉音乐之人,在乾隆皇帝对欧洲音乐产生短暂兴趣的阶段,魏继晋、出生于波西米亚的耶稣会士鲁仲贤(Jean Walter,1708-1759)以及遣使会(Congrégation de La Mission)教士德理格(Teodorico Pedrini,1671-1746)曾经奉命在内廷开设音乐课,教授青年贵族子弟。^③ 据葡萄牙耶稣会士陈善策(Dominique Pinheiro,1688-1748)记述,乾隆皇帝对魏继晋的音乐才能颇为欣赏:“陛下对他的才艺——演奏小提琴,喜爱有加,表达了最大的善意,并因此委托他为宫中一些年轻贵族讲授欧洲音乐。”不过,在陈善策看来,魏继晋更愿意将时间与精力奉献给传教工作,“他很久以来就异常渴望离开宫廷,……他想要去完成传教使命,去解救有罪的心灵”。^④ 一场重病让魏继晋的愿望得到满足,“在他卧床休息期间,熟悉的宫廷服务不得不中断,在他看来,善变的皇帝失去了此前对(欧洲)音乐的兴趣,在魏继晋神父康复之后,也不再被征召,这正合神父的心意,能够全身心投入传教事务。他前往距离北京五天路程的传教点。一段时间之后,因为宫中的那架风琴需要检修,神父被重新召回住院。他向我们大家表明,他与那些贫穷的基督徒在一起多么满足,他如何用令人身心极愉悦的欧洲音乐,按照艺术的标准带领他们祷告,吟唱赞美诗”。^⑤ 魏继晋的传教点距离

① [美]斯塔尼斯拉夫·叶茨尼克:《刘松龄:旧耶稣会在京最后一位伟大的天文学家》,周萍萍译,上海:上海三联书店,2014年版,第17页。

② [英]傅熊:《忘与亡——奥地利汉学史》,王艳、儒丹墨译,上海: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2011年版,第45-47页。

③ 鲁仲贤1743年信函,载 Francisco Keller (Hrsg.), *Der Neue Welt-Bott mit allerhand Nachrichten dern Missionariorum Soc. Jesu. Allerhand so Lehr-als Geist-reiche Brief, Schriften und Reis-Beschreibungen, welche von denen Missionariis der Gesellschaft JESU*, Vol. 34, Wien: Gedruckt und zu finden bey Leopold Johann Kaliwoda, auf dem Dominicaner-Platz in seinem Buch-Gewölbb, 1758, Nr. 682, S. 68. 在下文引用该文献时将使用中译书名,简称《新世界报告》。

④ 陈善策1743年信函,载《新世界报告》,第34册(1758年),682号,第83页。

⑤ 同上。